

362-370

6236(11)

第15卷 第4期  
1996年 11月

人类学学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Vol.15, No.4  
Nov., 1996

# 李济先生与周口店研究

## ——纪念李济先生诞辰 100 周年

张 森 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Q981

A

### 摘 要

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家。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 著作等身, 桃李满天下。他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上, 考古学的其他方面亦建树甚丰。本文仅就李先生在中国旧石器考古草创时期, 特别是在周口店本世纪 30 年代初发掘方法改革中的贡献等方面作简要的介绍, 以此纪念李济先生诞辰 100 周年。为使读者了解他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背景, 对其生平亦作点录。

古人类学

关键词 | 李济, 100 周年, 三点记载法, 周口店,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 1 李济先生生平略说<sup>①</sup>

李济先生生于 1896 年 6 月 2 日 (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出生地是湖北省钟祥县城内双眼井。从四岁起从父读书, 九岁入县高等小学堂, 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1907 年随父入京, 次年入江汉学堂, 学习半年, 转考入五城中学 (师大附中前身) 学习。1911 年初, 考入清华学堂, 在清华学校 (辛亥革命后改名) 学习 7 年逾, 主攻英语, 国文, 兼读理, 文各科, 成绩优良;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组织、参与以砥砺品行学问为宗旨的“仁友会”和话剧《平民惨剧》的义演等。

1918 年官费考取留美, 入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 学习心理学, 一年后改学社会学, 1920 年夏, 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所修课程除体质人类学外, 还有欧洲考古学 (侧重史前考古学) 和希腊考古学, 1923 年通过博士论文, 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学习期间, 他初对人口优生问题感兴趣, 做人体测量工作, 做人头骨处理技术的训练, 至 1922 年, 其人类学研究的才能, 引起美国人类学界的关注, 12 月被吸收为美国人类学会会员。

李济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 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为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收稿日期: 1996-06-20

<sup>①</sup>主要依据李光谟教授编撰并蒙惠赠一册与笔者的《李济先生学行纪略(未定稿)》, 在作文中得到王世民教授的很多帮助,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丁文江的鼓励和资助下,于1924年10月与地质学家谭锡畴一起去河南新郑,对被盗掘的春秋时期古墓进行考古勘查,是为他从事考古之始,李先生自认为此次工作是失败的,却从中得到宝贵的经验,悟出“从实际工作中,去找真实的材料与经验”(李济,1990<sup>①</sup>)。1925年应聘回母校清华学校,任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1926年,他与袁复礼先生一起,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主持田野考古发掘,在发掘工作中创造了田野考古工作中有重要意义的“三点记载法”(李济,1927)。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考古组,在傅斯年所长建议下,蔡元培院长聘请李济为考古组主任,他于当年辞去清华学校教职,于次年上任,并开始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在他的领导、组织和参加下,从1929年至抗战事起,进行了15次发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发掘开始几年用探沟探坑作点线结合的探索方法,使发掘工作愈做愈细。当时的安阳殷墟发掘的辉煌业绩,只有周口店工作可与其相匹。由于他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于1935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

抗战期间,他领导考古组,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对云南、四川、甘肃和陕西等省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他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殷墟出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上。抗战胜利后,他作为驻日中国代表团顾问,多方努力,使在日寇侵华时期被日本人掠走的许多珍贵文物和资料,其中包括周口店的发掘资料和文物得以回归祖国。1948年4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上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49年他迁居台湾,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考古研究和培养人材。1949—1959年任台湾大学教授,主持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69年1月,他年逾古稀,仍亲往考察台湾台东县长滨乡的八仙洞遗址,并给新发现的无陶器共存的石器文化命名为长滨文化(Changpinian)(宋文薰,1969)。从1949年到他逝世前,主要从事殷墟出土文物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为中国考古事业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笔者无力说明其意义,对此张光直先生(1990)有很好的评说,摘录于后,以饗读者:“从1949年以后三十年中,他在台湾所整理发表的殷墟资料和研究这些资料的许多成果与心得,也是中国考古遗产的一个重要成分,而且对今日中国考古工作也应当有一定的参考意义”(977页)。

## 2 李济先生与周口店研究

本世纪3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的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安阳殷墟的发掘和周口店以中国猿人遗址发掘为主的旧石器考古研究,硕果累累,工作方法多有创新,如翁文灏先生(1934)所言:“即就我们采掘方法而论,……其实也是不常见的细密与伟大”。翁先生是针对周口店工作而言的,而周口店工作方法的改进,与李济先生有密切的关系,这却很少有人提到,自然也鲜为人知。

<sup>①</sup>原文载于1961年《新时代》创刊号,此处引文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以下凡只注页码均出此文集,不另列参考文献。

谈周口店发掘方法的改进得从裴文中先生与李济先生关系开始。见诸文献的只有以下一段记载：“周口店石器多是石英制作，与欧洲燧石制的石器迥然不同。燧石的石器上，石头打的痕迹，很容易看出。但周口店石器则不然，打的痕迹很不容易认识。因有此石器的发见，及研究这种石器的困难，我不能不开始学考古学，最初从李济之先生（济），后又有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教授来平，我又从他学习”（裴文中，1934）。裴文中先生认识李济先生并不是上述记载所发生的1931年，很可能是在1929年。那一年裴文中先生曾短期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从李先生学习史前考古学应始于1931年。此前裴文中先生虽找到若干当时疑为以后证实是用火的证据的标本和少量的石制品，但并没有引起领导者的重视。1931年发掘鸽子堂，发现大量的石英制品，产生不同认识，“到1931年，裴文中宣布发现了石器的时候，曾有许多人反对”（裴文中，1955）。裴先生为解决自己惹起的“麻烦”，在当时的国内唯一能求教的是李济先生。如上述，李济先生在哈佛大学的三年里是选人类学为其专业，但当时美国人类学处于兼容并蓄时期，由其所修课程可知一斑。其所修课程包括体质人类学（人种学、人体测量学和化石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在考古学中则偏重欧洲旧石器考古学，有此广博基础，不难帮助裴先生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除上述记载外，在研究中国猿人石器中裴先生也曾谈到过李先生曾给他讲解欧洲旧石器考古知识并借给他一些考古学通论性的书阅读。只可惜当时不经心，具体内容记不起了。裴先生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在由古生物学者转向旧石器考古学者的过程中，除客观环境和德日进的影响外，李济先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启蒙的老师。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周口店发掘方法改变过程李济先生所起的作用。在1932年改革发掘方法以前，使用古生物的发掘方法，在划定的范围内，见化石就挖，“真是太无‘方法’了”（裴文中，1934）。至1932年，将以前杂乱无章的挖掘方法，改为探沟法，“即先掘一个探沟，宽一米半，长以三米为一段，约共长四五段，深五米。开完探沟之后，按所得地层的知识再挖”（裴文中，1934）。周口店发掘方法的改革始用“探沟法”，但裴文中先生在文中没有说明是自创的还是另有来源、依笔者揣测，恐非自创、若是，估计会有所交代，因此改革首用的“探沟法”，可能受安阳殷墟早期发掘的影响。1929年殷墟发掘，为探查殷墟的各种情况，共开了85条纵横的探沟，而那年裴先生参加过安阳的工作，其一有用此法优于古生物的发掘法的亲身感受；其二1931年又亲聆听李济先生的教导，对考古方法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前面我们提到过，早期安阳殷墟的发掘主要是用探沟探坑来作点线式的探查，周口店1932年发掘方法的改革，大体也用这种方法，裴先生如下记述颇能说明这一点。“探沟开毕将待开地方，分为若干方，再按由探沟所得知识，按方开掘，每方为九平方公尺”（裴文中，1934）。从目前资料分析，周口店1932年发掘方法的改革应是借鉴了安阳殷墟早期的发掘方法，从此使周口店的发掘步入了新阶段，采用了考古发掘方法，取得诸多的人类行为资料和其他方面的信息，是与李济先生创造的发掘方法分不开的。

上述仅说明发掘方法问题，布方和记录仍缺乏规范化，可能裴先生在改革周口店发掘方法过程中，学习到李济先生更好的发掘方法，即1926年在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创造“三点记载法”和“层叠记载法”。在次年山顶洞发掘中基本上采用了这两种发掘记录的方法和布方的方法。为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先介绍一下李济先生所创造的

“三点记载法”和“层叠记载法”。李济先生写道 (1927):“就这个开挖的计划, 我们发明了一个“三点记载法”。随着各方开辟的先后, 我把它们用数目号起来。故第一‘方’动手最先, 第二, 其次, 依次递进, 但是因为土层变换的缘故, 挖到下层, 也有转变秩序的时候。这坑东西行叫着 X—线, 南北行, 叫着 Y—线; 向下行叫着一 Z 线。前‘方’的 Y—值是正数, 后‘方’的 Y—值是负数, 各‘方’的交界点都有木椿作记。……照这样的方法进行, 我们用两根米达尺在数秒钟内把所找的物件的原位可以确定出来。这种方法, 我叫着‘三点记载法’, 三点就是 X—Y—Z 用米达尺表出来的三价值。为更好地了解“三点记载法”, 特附西阴村 1926 年发掘的平面图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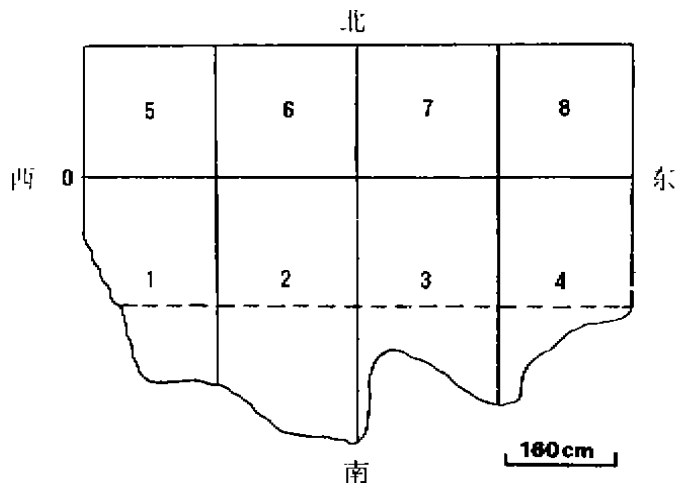


图 1 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坑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the excavated pit of a Neolithic site at Xiyin village of Xia County, Shanxi province

注: 1—8 为方号; 东—西为 X 线; 南—北为 Y 线

同时我们又用层叠法记载一切屡见的物件。由起点下行第一公尺叫着 A 层; 第二公尺, B 层; 依次递降, 用英文字母大写作记。每层内又分着好些分层。分层的厚薄, 由土色及每次所动的土的容积定。分层按上下次序用英文字母小写字作记” (李济, 1927)。如 B4c 就意味着此标本出自探方 4 距基点水平二层内之第 3 分层。

现在再介绍一下山顶洞的发掘方法和记录的方法, 从中可以看到受“三点记载法”和“层叠记载法”的影响。为行文方便, 笔者将裴文中 (1934) 和贾兰坡等 (1984) 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合在一块。

在 1933 年发掘山顶洞以前作了规划, 以  $1\text{m}^2$  为一方, 以  $0.5\text{m}$  为一水平层, 先定好南北向, 而后将遗址以  $1\text{m}^2$  为一方的规格划分成若干方, 每隔  $1\text{m}^2$ , 两端钉立木桩, 拉成若干纵线, 然后按正东西方向, 每隔  $1\text{m}$ , 依次拉横线, 这样形成发掘方 ( $1\text{m}^2$ )。每方有编号, 由东向西以大写英文字母标方号, 即 A、B、C、……由南向北则用阿拉伯数字 1、2、3、……编号。每个技工管辖两方, 开掘时, 先绘 1:50 之平面图, 每下挖  $0.5\text{m}$ , 绘平面图, 每隔  $2\text{m}$ , 绘南北向剖面图, 凡是人类的遗物及其他各种重要化石及重要的地质上的观察结果, 都画在图上, 并记录在标本上, 如裴文中著《周口店山顶洞文化》(1939) 图 6A 上有 33:95:05:5H, 依当年开工时间和平、剖面图即可查出其发现时间和发现位置及距基点的距离<sup>①</sup>。此外, 每天从不同的三点, 更照像三张, 是为记录照相。

依上述, 在山顶洞遗址发掘中, 基本上采用了西阴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方法和标本记录的方法, 但并没有墨守成规, 而是有所发展, 发掘工作做的更细, 文字、绘图和照像记录更详。在此基础上, 至 1935 年, 在发掘周口店第一地点时, 先画出一条中

<sup>①</sup>因暂时未找到原山顶洞发掘布方图及工作日志, 故无法附图及注明具体发现时间。

线，而后以 2×2m 打格分方，自西向东方号用大写英文字母依序标出，但探方序号用阿拉伯数字标出，中线以南各方为正数，以北各方为负数（图 2），类似标识，也见于西阴村遗址发掘平面图上，但两者方位有别，后者可能更符合周口店实际。“三点记载法”和“层叠记载法”现在看起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正是受这种当时是非常慎密的布方和记录方法的影响，使周口店的发掘和遗物出土记录步入规范化。从 1933—1937 年，拿到任何一件标本，都可知其发现时间、所处的位置和水平层位，通过剖面的换算，即可知其所属的地质层，中国猿人石器研究得益于标本上的详细记录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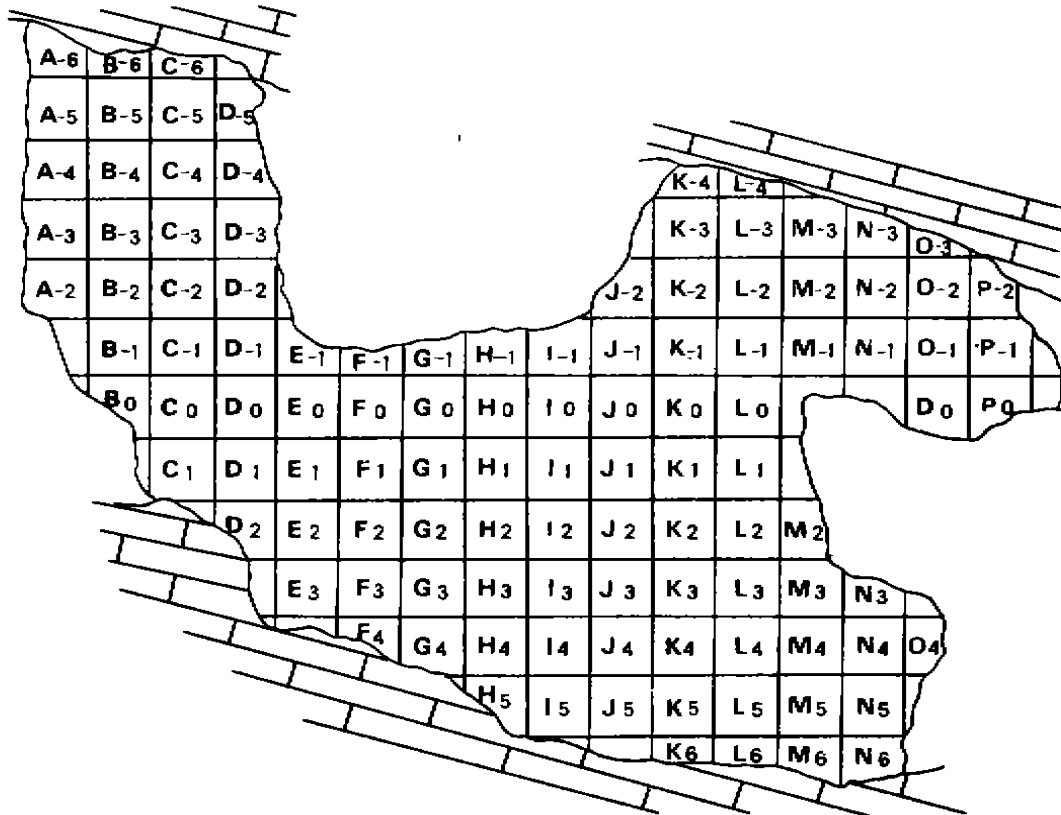


图 2 周口店第 1 地点第 16 水平层发掘坑的分布 (1935 年 10 月 17 日—11 月 19 日)

Distribution of the excavated pit of sixteenth level in Loc.1 at Zhoukoudian

在周口店早期工作中，最大的不幸是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使从 1927—1937 年从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和山顶洞人化石等，在珍珠港事变前后，在几个美国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一批宝贵的资料和标本或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损坏或掠走，使周口店发掘被迫中断，研究工作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到了谷底。

抗战胜利后，裴文中先生曾请国民政府代表团科学顾问李济先生代为寻找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等化石的下落，在李济先生返国后，裴先生曾函询有关情况调查的结果。李先生在接到裴先生的信后当即作了回复，信称“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大所存之周口店石器骨器已交出（弟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東西）由总部保管。

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后”(图版 I)。由这封简短的信可以看到李先生为寻找中国猿人化石和山顶洞人化石等的下落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虽无结果,但功不可没。通过他的努力,很快使一批周口店的珍贵资料和标本回归祖国,使它成为对周口店文化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被日寇掠夺走经李济先生的努力回归祖国的标本包括第一地点石制品 3 件和用火遗迹——烧过的鹿角碎块;第 15 地点石器 6 件,山顶洞石器 4 件,磨光鹿角 1 件,狐狸和獾的犬齿 44 枚,未磨过的狐狸和獾犬齿 37 枚,狐狸犬齿 (type) 一箱,石珠 3 枚,石坠、骨针、有红色的石灰岩块、大型鹿类犬齿一箱,人工穿孔的蛤蜊 (*Area sp.*) 鸟骨坠、鱼骨、鱼的脊椎骨和石珠一箱;资料计有,周口店第一地点平、剖面图及其他文献和电影片等。

李济先生的历史观,决定了他非常重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上古史,应包括史前史。他指出“史前史的资料,广义的话,全是上古史的资料”(81 页),他非常重视周口店研究工作的进展,并给予周口店的发现以极高的评价,如“‘北京人’,这震撼了全世界科学的一大发现……。在早期人类演进的途中,他是一具最重要的里程碑,代表人类蜕变期的一个决定阶段,为解释现代人形成的不得不知道的资料”(18 页)。在他移居台湾后,仍对大陆上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十分关注,写了几篇有关中国旧石器综合性的论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对周口店研究进展尤为关心,哪怕是一点点新发现,如笔者报道的周口店第 22 地点 5 件石制品,也被李先生记入《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一文的后记中:“张森水报告:据《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 年 7 卷 1 期周口店第二十二地点发现了一批旧石器;计有石核 1 件,石片 1 件,及刮削器 3 件。原料为脉石英,制作方法为石锤打制,加工修理,和周口店他处制法类似。同出土之化石与第十五地点所出者相同,故时代可划分在周口店文化四期”(164 页)。关于李济论述以周口店为主的综合性论文将在下面加以评价。

李济先生在旧石器考古学方面的建树,可以《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和《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两篇论文为代表。首先从这两篇论文可以看到李济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思想,比较地探索,不作简单化想当然的结论。在这两篇论文中,兼顾中外地引用了古人类学、第四纪地质学、旧石器考古学当时他能见到国内外的资料;其次,通过他自己的慎密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认识和发人深思的问题。

《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一文首先简要地记述周口店的研究史和该地区的地质记录,继之介绍了北京人在分类上的国际新见以及摘述了北京人的体质特征,在最后部分就北京人与蒙古人种关系综论各家的看法后,他讨论了两个问题:“(1) 现代中国民族是否完全为纯蒙古种人的结合;(2) 所谓蒙古种的人种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定义”(117 页)。对于后者,他对通常定义的蒙古人种体质特征如铲形门齿、颧骨高,和鼻骨宽在不同人种和不同时代及不同地区的存在和出现率的高低的分析,他认为这些性质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通行的定义中所举的若干蒙古种特征,实在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判断,由科学家加以证实而已。至于北京人与蒙古人种关系,他认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不能肯定地说蒙古种和北京人的关系密切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否认若干事实,即蒙古人种的身体内挟带有北京人的一部分遗传因子”(120 页)。

对于上述的第一个问题,他赞同魏敦瑞的观点,“一个人种也象其他的生物一样,都是

混杂的，世界上没有纯种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一个民族的形成是更为混杂的。……我们可以从单纯的血缘单位所构成的‘种’，演为综合文化单位所形成的‘族’这一过程中，看出每个民族经过的一般历史。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讲中国上古史，由北京人说起，确有很好的理由”（120页）。

在“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一文中，作者对1930年以前发掘工作的失误作了评述，指出“所追寻的目标，集中在化石人的遗骸上”（129页）。对周口店诸文化地点（不包括山顶洞）的时代序列提出了分四期的看法，第一期以第13地点为代表，第二期以鸽子堂石英Ⅱ层为代表，第三期以第1地点Aa层（见“中国原人史要”图7），第四期以周口店第15、4和22地点为代表。在本世纪50、60年代，在国内文献中，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三分法（裴文中，1954；贾兰坡，1958，1962，1964）划分出第四期是李济先生的新见，在以上所引的文献中，都把李先生第四期看作与北京人晚期相当，但在裴文中1955年的论文中与此有部分近似的看法，在把第15地点视为相当于北京人文化晚期的同时，而把第四地点看作晚于北京人文化的周口店期的最晚阶段（裴文中，1955，89页）。

在本世纪50、60年代，国人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多着眼于以遗物为中心的类型学、工艺学的研究，极少涉及文化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李济先生是国人较早注意这方面研究者之一，他认为“文化的大部分虽是人的创造，但它所受的自然界的约束就同人的身体一样，有很多是直接的。……文化的历史和地理的历史有很多密切的关系”（162页）。这些看法，在当时，在国外文献已有所论，已如上述，在国内，在研究论文中极少提到。由此可以看到，李济先生兼顾中外、博采众长的治学的思想，不愧是站在中国考古学最前沿的研究者。

在这篇论文中，李济先生对北京人生活进行概括，他特别强调用火和控制火在人类发现史中的作用，“其重要程度，不是任何石器或骨角器所能比拟的”（163页）。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不拟一一列举，这里仅举一点，关于周口店第13地点性质问题，除李济先生此文外，尚无人讨论过，现摘述如下：“照裴氏的原报告，这一堆积的上段全是在露天的山坡旁形成的，在这时候，人类访问此地，显然只是季节性的，所以很多野兽尚能保存全尸；至于石器和火的痕迹，只能算作寻找食物的游客、猎人偶然留下来的，而不象是长期居住的遗存”（134页）。

李济先生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贡献，决不是笔者能力所能全面地表述的，以上记述很可能是挂一漏万、捡轻失重之说；作此短文仅仅是对这位考古学巨匠和前辈表达敬意和怀念。李济先生的一生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张光直先生曾有精要的论述：“李济先生是中国现代的第一个人类学家，他也是中国的头一位科学考古学家；他的考古学的一大特色正是它具有人类学的特点，是广博的，不是狭隘的、专业化的；是重比较、向外开放的，不是闭关自守的”（981页）。时至今日，李济的考古学特点并没有过时，仍须发扬光大，沿着这条治学之路走下去，把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推向更广、更深方向发展，寻找更新、最可靠的材料，贡献于中国上古史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宋文薰. 1969. 长滨文化(简报)—台湾首次发现的先陶文化. 中国民族学通讯, (9): 1—27.
- 张光直. 1990. 编者后记. 见张光直、李光谟编.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977—993.
- 张光直, 李光谟编. 1990.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李济. 1927.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 北京: 清华学校研究院印行.
- 贾兰坡. 1958. 中国猿人化石产地 1958 年发掘报告.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1): 21—26.
- 贾兰坡. 1962. 涿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贾兰坡. 1964. 中国猿人及其文化. 北京: 中华书局.
- 贾兰坡, 黄慰文. 1984. 周口店发掘记.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裴文中. 1934. 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 地质专报乙种第七号. 北平: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印行.
- 裴文中. 1955.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见: 郭沫若等著. 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53—90.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Davidson Black, Teilhard de Chardin, C.C. Young *et al.* 1933. Fossil Man in China. Geol Mem Ser A, (11): 1—166.
- Pei Wen Chung. 1939. The Upper Cave Industry of Choukoutien. Pal Sin new Ser D, (9): 1—52.

## PROFESSOR LI JI'S CONTRIBUTION TO PALEOLITHIC STUDY OF ZHOUKOU DIAN REGION

—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Ji's centennial birthday

Zhang Senshu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100044)

### Abstract

Professor Li Ji was one of founders of archeology and the first anthropologist in China. He worked all his life for archeological study in China, wrote many papers and books and had many pupils. Though his contribution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hang sites in Anyang from 1929 to 1937 and the study of cultural remains from the Shang sites from that time through 1979, he reaped rich frui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arche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 for example, he also did important works in the realm of the paleolithic archeological research. Professor Pei Wenzhong sai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study stone artifacts discovered from Loc. I at Zhoukoudian, I began to learn archeology and learn from Professor Li Ji at first" (Pei, 1934). The excavation process in Loc. I at Zhoukoudian was reformed in 1932. The new excavation adopted a method including a combination of test ditch and test square. This method had been used in the excavation of early stage in Shang sites in Anyang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Li Ji. When Upper Cave was excavated in 1933 Professor Pei adopted other excavation method which was formulated and named as "three dimension space record process" by Professor Li Ji and was used at first time in 1926 in excavation of the Neolithic site at Xiyin village of Xia County, Shanxi Province. In addition, Li Ji had contributed interesting ideas to the study of Zhoukoudianian culture. In the present paper Professor Li Ji's life story is briefly introduced for helping the readers to know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n which he gaine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archeology.

**Key words** Li Ji, 100th anniversary, Three dimension space process, Zhoukoudian, Paleolithic archeology